

山西票号研究集

S H A N X I P I A O H A O Y A N J I U J I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编

山 西 财 经 大 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山西票号研究集

S H A N X I P I A O H A O Y A N J I U J I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编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主编.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 - 7 - 5096 - 0210 - 2

I. 晋… II. 山… III. 商业史—山西省—文集
IV. F7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7601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杜 菲

责任编辑: 杜 菲

技术编辑: 晓 成

责任校对: 郭红生

720mm × 1000mm/16

16.5 印张

228 千字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 12 册 总定价: 432.00 元

书号: ISBN 978 - 7 - 0210 - 2/F · 206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编委会

学术顾问：孔祥毅 张正明

编委会主任：杨怀恩 原梅生

编委：樊而峻 郭泽光 赵国浩 崔满红 王 森
黄鉴晖 葛贤慧 武三林 阎应福 孙长青
张亚兰 王永亮 乔 南 陶宏伟

主 编：崔满红

编辑部主任：王永亮

编 辑：陈 啸 薛秀艳 杨志勇 侯海燕

总序

山西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商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劲旅，明清晋商更是因创造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而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巨擘。历代晋商及其成就的辉煌事业虽然早已渐次消逝，但他们从崛起到兴盛、由兴盛而衰落的史实却蕴藏着丰富而绚烂多彩的知识瑰宝，在经济、管理、社会、艺术、法律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山西财经大学是国内建校时间最早的财经类高等院校之一，是从乔家大院走出来的商科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始终是学校的优势学科，晋商研究始终是学校科研工作的特色之一。学校有组织的晋商研究工作已有近50年的历史。

1960年，原山西财经学院成立了山西票号史料整理小组，开始了晋商史料挖掘和研究工作。经过30年的研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杨荣晖，《光明日报》1961年5月22日第4版）、《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一集》（山西财经学院1982年编印）、《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二集》（山西财经学院1984年编印）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初版）为主要代表，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开始，原山西财经学院的晋商研究工作突破了经院范式，呈现出历史考证与现实借鉴相结合、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并举的特色。1997年10月，原山西财经学院和原山西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合并，更名为山西财经大学，学科特色和学术传统得以继续和加强。2002年，学校建成了金融货币史博物馆。2004年，山西省教育厅依托我校建立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这个阶段，我校的晋商研究视角不

山西票号研究集

断拓展,研究成果更加丰硕——《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孔祥毅、张正明,《山西日报》1991年11月18日、19日连载)、《山西票号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2年修订)、《明清山西商人研究》(葛贤慧,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年)、《中国银行业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商路漫漫五百年》(葛贤慧,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金融贸易史论》(孔祥毅,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晋商经营之道》(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晋商在会计发展史上的贡献》(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增订)、《山西票号研究》(孔祥毅、王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孔祥毅,《金融研究》2002年第8期)、《金融票号史论》(孔祥毅,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镖局、标期、标利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孔祥毅,《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中国钱庄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中国典当业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年)是其中的代表。

近年来,学校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突出办学特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商科大学教育教学模式的要求,明确将传承晋商文化、弘扬晋商精神、构建学科体系、培养商科英才作为办学指导思想,并加大了各项投入,在科学研究、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博物馆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2007年,学校将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更名为晋商研究院。为了秉承学术传统,强化办学特色,开创晋商研究工作新局面,学校设立了晋商研究专项基金,责成晋商研究院编辑、出版了这套“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本文库不限定册数,不定期出版。今后将陆续推出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热忱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孔祥毅

2008年1月10日

出版说明

国内外对山西票号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陆续有一些重要的成果（参见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经典文库）问世。

1960 年，山西财经学院（山西财经大学前身）开始有组织地进行了山西票号史料搜集和研究工作，搜集了数百万字的资料，撰写了一些文章和六七十万字的书稿。遗憾的是，受“文化大革命”和“左”倾思潮的影响，书稿出版和公开的、有组织的研究工作被迫搁置，不少资料失散。

1979 年，山西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联合组成了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恢复并加强了票号史料搜集与研究工作，最终于 1990 年将 100 多万字的《山西票号史料》公开出版。

1982 年 6 月，山西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发起，在太原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山西票号学术讨论会。会后，学院将会议纪要、论文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发言稿结集编印成了《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一辑》。1984 年，山西财经学院又编印了《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二辑》。这两本专集在经济史学界和金融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后来的研究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两本专集都不是公开出版物，印行数量很少，受益范围非常有限。为便于更多的研究者参阅，我们将这两本专集合并重印，公开出版。

同时，为便于读者理解这两本专集中的有关内容，我们将 1961 年署名为杨荣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和黄鉴晖先生的一篇未刊稿作为附录，一并出版。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目 录

第一辑

山西票号学术讨论会纪要	言 实 (1)
我对票号起源和性质的看法	盛慕杰 (6)
山西票号产生的背景与高利贷性质	孔祥毅 (15)
关于票号资本的性质	杨士英 (21)
从社会经济发展中考察票号的性质	张国辉 (26)
票号的性质主要是高利贷	徐 澜 (36)
论山西票号的起源与性质	黄鉴晖 (38)
试谈山西票号的性质	李运元 (80)
我对票号一些问题的看法	李 华 (89)
几点想法	闫应福 (93)
略论山西票号、上海钱庄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洪葭管 (95)
票号是封建性的金融组织	荣韞瑶 (103)
票号的封建金融组织的性质	郝建贵 (105)
山西票号兴废述略	范富华 (107)

· 资料 ·

80 年来关于票号问题研究的概况	(115)
------------------------	---------

第二辑

- 怎样理解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 李培棠 (119)
- 《山西票号史料》及山西票号的几个问题 默汝声 (129)
- 19世纪前半期中国票号业的产生及其初步发展 张国辉 (146)
- 中国的汇票和汇兑制度的发展
- 从山西票号谈起 黄鉴晖 (163)
- 票号在四川的活动 田茂德 (181)
- 顾炎武、傅山参与创建票号说考辨 师育谦 (196)
- 清代王锡纶两篇诗文的介绍 江 地 (203)

· 人物志 ·

- 雷履泰 (211)
- 李宏龄 (213)

· 资料 ·

- 中国政府对“银行”的最早解释 (217)
- 1961年关于山西票号性质作用的讨论 (219)

附 录

- “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 杨荣晖 (221)
- 我对《“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的管见 黄鉴晖 (231)

第一輯

山西票号学术讨论会纪要

言 实

山西财经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发起组织的山西票号学术讨论会，于1982年6月20~26日在太原举行。应邀参加讨论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财贸学院、四川财经学院、山西大学历史系、经济系、山西省地方志编办、山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教授共34人。

原山西省人民政府赵军副省长到会讲了话。

山西票号学术讨论会，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举行的第一次重要的讨论会。会议期间，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交流了研究成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次讨论会的一个特点是研究较前有了进步，并且有了新的突破。同时，对《山西票号史料》进行了评议，提出了继续深入研究山西票号的意见。

这次讨论会着重讨论了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发生时代和票号的性质与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之季，特别是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商品经济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较前活跃，货币流通量增大。由于交通运输的不便，造成埠际间货款调拨困难，与商品交换发展不相适应。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有些商品组织吸取历史上汇票的经验，遂兼营起汇兑业务。但大多数货款结算，仍依旧采用运送现银的方式。商品经济发展在客观上要求信用组织与其相适应，这就是山西票号产生的背景。

山西票号起源于汇兑，进而发展为全面经营存、放、汇兑业务的金融组织。票号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发生的时代，根据目前占有的资料来看，在清代道光初年，已经在中国北方的京、晋、直隶等地区有了。这是与会多数同志的意见。这时，中国已经有了民信局，承担着从南到北城

镇间的书信传递，从而结束了几千年来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也为票号发生创造了客观条件；苏州是南北货物集散地的一个较大市场，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北方各省的商人去苏州办货，由过去每年要带去白银数百万两的情况，从道光七年（1827年）秋冬以后，已经改为汇票往来了；山西票号的第一家可能是山西平遥县的“日升昌”。“日升昌”前身是“西裕成颜料铺”。在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北京平遥颜料会馆的碑刻中，有这个颜料铺的名字。但道光九年（1829年）另一碑刻中没有西裕成了，这大概说明西裕成颜料铺已改为“日升昌”票号，不再是平遥颜料会馆的成员了。

关于票号发生的时代，这次讨论会是初步的结论，并不是定论。有的同志认为，根据清代康乾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推断可能发生的还要早一些。这就有待今后继续发掘材料，做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有三种意见：

一、票号是高利贷资本

对于票号高利贷资本的性质，由于认识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种：

一种意见认为，票号是封建高利贷。其理由是：①票号资本是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商业剥削三位一体的资本。②票号主要是为清廷财政和封建官吏服务的。虽然也为商业服务，但票号从商业中取得的利息，最后都要转嫁到小生产者身上，具有高利贷的特征。③票号盈利的主要去向，是购买土地、修建住宅、用于奢侈的生活、捐输报效清王朝以及窖藏，很少向近代工业投资。④票号组织管理是封建家长制。正因为这一切，在辛亥革命后，它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衰败。

另一种意见认为，票号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但主导本质的是高利贷资本。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考察，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发展和变化，票号的性质有了一些变化。鸦片战争前，商品经济是封建经济，鸦片战争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票号经历了这样两个时期，在与商业和产业资本的某些联系中，不能不具有资本主义因素，但它固有的高利贷性质并未改变。

二、票号基本属于借贷资本的性质

这种意见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票号是借贷资本。其理由是：①票号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即旧的制度在瓦解、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发生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时期，它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于封建高利贷资本。②票号从它产生到衰败，主要是为商业和晚期的一些工业服务的，这与高利贷主要是为小生产者和封建主服务是根本不同的，它们的关系是货币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或产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商业组织在鸦片战争前后有一个特点是工商不分，或者说是工商混合的商业组织。这个特点反映在票号资本来源和服务对象上，就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或资本主义的性质。③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票号同清财政、官吏结合起来，汇兑大量公款，并向一些省关和清军贷款，起着消极的作用。但是，不论汇兑还是贷款的数额，都在票号整个业务中占的比重不大。④票号的汇费和贷款利率，都大大低于同期典当业、民间高利贷利率水平。当然，票号也有封建性的一面。这除了为清政府服务外，还有组织管理上的家长制，平色余利的超经济剥削，放款重信轻抵押等。但本质上是借贷资本。

另一种意见认为，票号基本属于借贷资本的范畴。持这种意见的同志，是分阶段来论证票号性质的。鸦片战争前，封建生产方式中资本主义因素已有相当发展，票号主要搞汇兑，也经营商业贷款，说明资本主义因素已在金融业中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时期，票号的性质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金融组织。鸦片战争后，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发展，票号的资本主义性质日益突出。因为票号作为私人经营的货币资本，相对于外国在华投资、买办资本以及官僚资本，属于民族资本的范畴。虽然，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一直没有形成平均利润，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票号的借贷资本性质。正如旧中国的民族工业一样，并未因没有平均利润率失掉它的资本主义性质。至于票号管理上的封建性，这是封建社会的痕迹，就连近代工业也难以避免。从生息资本来考察票号，当然属于借贷资本，或者说基本上属于借贷资本的

范畴。

三、票号是封建性金融组织

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票号既不是高利贷资本，也不是借贷资本，而是封建性金融组织。由于认识和表述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异。

一种意见认为，票号是封建性金融组织。票号从产生到衰败，为商业服务的方向没有改变，利率水平不高。一般的高利贷利率是月息二三分，而票号低于这个水平。因此，它不是高利贷资本。借贷资本是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产生的。票号不是产生于产业资本，而是基于商业资本的需要。中国那时的商业资本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商业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能说票号是借贷资本。从票号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它紧密同清政府结合，大量汇兑公款和对一些省关垫款，这是高利贷性质；借贷资本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平均利润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下才形成的。中国根本没有平均利润，所以票号的性质更不是借贷资本。

另一种意见认为，票号的性质是货币经营资本。票号从它的起源，管理体制、组织形式和一些规章制度上来看，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而且，从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票号业务内容的变化上来看，它又具有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可是中国在道光、咸丰年间，还没有新兴工业，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这种资本主义的因素，也就不能认为是借贷资本。而票号的性质，基本上是货币经营资本。

另外，讨论会对《山西票号史料（初稿）》一书进行了初步评议。《山西票号史料》是在山西财经学院“文化大革命”前初稿的基础上，从1979年10月开始又和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合作编写的，经过许多同志20多年的辛勤劳动，搜集了大量的清政府档案、票号信件、账册、史籍、报刊和访问资料，选编出一本材料丰富，前所未有的，百万字部头的史料书初稿。大家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它对科研、教学部门很有参考价值，期望能早日出版，以填补票号史料这一空白。与此同时，各位专家、教授较详细地提出了修改充实的意见，为改好稿子创造了条件。

山西票号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这次讨论会，开了一个好头，还要

继续搞下去。目前，由于对资料的占有不同，对马克思关于生息资本的理解的不同，因此在理论联系实际，对票号性质的研究上，分歧都比较大。为了进一步把山西票号研究开展起来，与会同志倡议组织一个山西票号研究联络点，以便联系和组织各方面的学者、专家，广泛开展研究活动，逐步地对票能取得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为建立和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金融史作出贡献。与会同志期望山西财经学院把这一重任承担起来，财经学院表示接受这个任务。

我对票号起源和性质的看法

上海市人民银行 盛慕杰

笨鸟先飞，在没有讲我的看法之前，我先说明一下。《山西票号史料》经过差不多 20 年的搜集发掘，目前是相当完备的，可以说是发先人所未发。以往许多资产阶级学者进行过研究，其中如赫赫有名的陈其田、卫聚贤的著作。但以往的许多著作里没有讲到的内容、没有发现的东西，《山西票号史料》发现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下面谈谈我的一些意见。

第一个问题：山西票号发生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面，我有很多问题现在尚未搞清楚。简介里说了票号和账局的关系，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肯定了票号和账局的彼此继承。如果它们之间确有这种关系，那么，是如何继承的呢？据目前发现，账局发生的很早，大约在乾隆年间。根据资料证明，账局有一部分后来改了票号。但我们又看到，清政府有些官员曾经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奏折下面附了一个表，这个表是当时在北京比较大的票号。现在，在这一名单里面肯定下来一部分是票号，一部分是账局。这里有一个问题，清政府的官吏对账局和票号很显然没有分清楚。他们是否把账局和票号看作一个东西，还是个问题，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因此，我又考虑到，说账局只是经营放款，没有其他业务，以我的浮浅的见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典当抵押，它的所谓放款，就是抵押放款，它哪里有这么多的资本来抵押放款呢？只有吸收存款。

既然肯定了账局和票号是继承关系，那么，有必要进一步弄清账局的

性质及同票号的关系。

简介总结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从明末钱铺发生算起，大约每隔八九十年就要有一种新的金融组织出现。如果这是中国金融发展的规律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明末是天启、崇祯两个朝代，天启大概是1626年。我们假定是1620年开始有钱铺，加上90年，是1710年，1710年应是雍正，再加上90年是1800年，1800年是嘉庆。这样推1620年是钱铺，1710年是账局，1800年应是票号，那么，是不是一个规律，要进一步弄清。

简介肯定了账局和票号的关系，那么，账局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呢？

第二个问题：票号发生的时代。这个问题，历来有争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票号是近代经济史和近代金融史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经济史，不能不研究票号；研究鸦片战争以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史，也不能不研究票号。因此，票号产生的大体时间弄不清，是说过去的。

江苏太仓有个陆世仪，生于1611年，死于1672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论钱币》。他说，各地方的人想把他的资财弄到北京去的时候，都是使用的“汇票”。陆世仪写文章时大约40岁，应该是清初，这篇文章收进《皇朝经世文编》里。

上例可以肯定，汇票是从那时开始的，并可以肯定是由商人承办的。这商人是不是票号，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再推前一些，在明代，大概从1407年起，已经开始流通纹银。官家为了解决明政府的财政困难，也开办吸收民间资金和搞汇票的业务。当然我们不是说，唐朝的“飞钱”就是明末清初的汇票。有一点可以肯定，明末清初的汇票就是我们以后的汇票，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断定票号发生在什么时代，还需要下工夫。我举这两个例子证明这样一个问题。

一般讲票号发生在北方，南方是钱庄，广州是银号。我们看，上海钱庄在1776年就已经很发达了。在一国内，这个地方银钱业发达，那个地方银钱业就没有兴起，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当时商品经济和国内贸易的发展看，如肯定票号在钱庄以后，就肯定了当时的商品经济非常不发达。我总想，票号发生的时代和钱庄发生的时代不可能相差这么远。我们现在说票号产生是1826年，而钱庄在1776年相当发展了，如何把这个矛盾统一起来呢？需要财经学院的同志研究。

再举一个事例，我看到很多文章里讲，“银行”一词是从日本来的。什么地方来的？意大利怎么样？实际上，“银行”这两个字，在广东银号老早就有了。广东的中心银行堂老早就有，历史很久。所以说票号后于上海钱庄，后于广东银号，很难理解。

我们知道，中国的国际贸易最大的两项：一个是丝；另一个是茶。丝我们不去讲，我们这里只讲茶。茶，主要是福建的茶。由武夷茶区到江西的河口（票号史料里讲在河口有票号的分庄），由河口经陆路运到广东出口。从河口到产茶的地方，是有很多所谓“西商”在那里活动。现在，“西商”已很难理解，有的说“西商”就是票号，有的说“西商”是山西人。究竟怎么一回事，也搞不清楚。但证明，在鸦片战争前，在我们刚刚有茶叶出口或茶叶出口大量发展时，金融业也有相当的活动。那么，这种金融活动究竟是由谁来搞的？现在来看，肯定不会是钱庄，因为讲“西商”在那边活动，是不是能和票号联系起来？

简介说苏州是在道光七年秋冬，市场上才流通汇票的。估计苏州在1827年前有票号存在。如果说苏州1827年有票号存在，那票号机构应早有发展。因为票号从北方向南方发展要有一个过程。这是从反面来论证票号产生年代是相当早的。我不同意这样一个看法，说那时市场上已没有现银，而只是汇票流通。应该理解，1827年是中国白银大量流出的那一年，一定会反映在国内市场上。白银大量外流，鸦片大量进口，正是转折时期，正是银贵钱贱的时候，当然市场上现钱较少，要使用汇票。总之，票号产生于何时？似乎还有待进一步考虑。

第三个问题：票号发源于我国北方，60年代向东南转移的问题。这个问题，简介中有一个不得当的地方。“票号基于国内贸易和中俄贸易发展的需要，发源于京、晋、张家口等地。”这与历史事实完全相符合，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谈的中俄贸易情况也完全符合。

但同时有些地方还有些过失。简介讲：票号的发生并不完全是产业资本、资本周转的产物。“并不完全是”，至少承认有一部分是。如果联系到票号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时是否资本主义萌芽了？即是说票号发生于1820年，不要推得太早，这还是鸦片战争之前，这时应是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封建经济，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并不完全是”这种提法证明1820年以前已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个问题牵涉到票号的性质问题。